

第一章

创生与东传——印度 佛教与中国佛教

- 佛祖诞生的传说
- 释迦牟尼出家
- 悟道的艰苦经历
- 四谛十二因缘
- 佛教传入中国
- 汉桓帝把释迦牟尼请进了
 皇宫
- 《四十二章经》

一、菩提证道

佛教产生在古印度 创始人释迦牟尼 原名悉达多·乔达摩 本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 今尼泊尔境内 的王子。释迦是其族名，牟尼意为圣人、尊者，是他得道后人们对他的尊称。经各种资料推断 佛祖的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 565 年至 486 年，与中国的圣人孔子大体同时。

关于佛祖的诞生，有许多神奇的传说，这其中有许多属于教徒们为了神化佛祖而编造的神话。但拨开千百年来笼罩在佛祖头上的祥云瑞雾，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个智者艰苦创教的足迹。悉达多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，聪明勇敢 乐善好施。在他统治下 人民安居乐业 可以顿顿吃到白米饭 所以他得以享此美誉。王后摩耶夫人 天姿国色 温和慈祥。但是他们人到中年，有一件不顺心的事，就是膝下尚无子嗣。在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摩耶夫人忽得一梦，觉得自己腾云驾雾，升上天空。天神照料她在天湖中洗浴，一只白象跑来，用长鼻子在她肋下一点，她顿时感到有一股气体直入体内 从此便怀了孕 这便是佛教神话中的“白象受胎”。10 个月后，摩耶夫人按照印度当地的习惯回娘家生产，途径蓝毗尼园时，她突然腹痛难忍，便生出了小王子。这个小王子就是日后的释迦牟尼。据佛典说 当佛祖降生时 和风徐来，异香醉人，九条金龙飞来喷出香雨，淋浴佛祖。小王子一生下来 便向四方各走七步 说：“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” 以此证明他异于凡人。

王子出生后 7 日 他的母亲便去世了 是在其姨母的照顾下长大的。净饭王对小王子寄托了很大的希望，期望他能继承王位，使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王子天性善良，看到当时因印度诸国连年的战争，人民生活痛苦不堪，心情经常抑郁寡欢。为了使王子安心、快乐，在他 20 岁时 国王为他娶了邻国贤惠美丽的公主耶输陀罗为妻，并在后宫安排了众多的嫔妃。一年后，公主为他生了儿子罗睺罗。但这世俗的荣华富贵 并不能打动圣贤之心。净饭王下令不许王子看到人间的悲惨景象。可在一次出游的路上，王子还是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人生苦难的一面。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叟，佝偻着腰，喘着粗气，艰难地行走；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，全身浮肿 眼球突起 张大嘴巴拼命呼吸 饱尝临终的痛苦；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面色死灰 双眼紧闭 亲人们嚎啕痛哭 准备火葬，……这一切在王子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他决心舍弃世俗的安乐富贵，离家出走，去寻找解救人类的“大道”。

释迦牟尼出家悟道的经历是漫长而艰苦的。他最初在森林中漫游 野兽的袭击 刺藤的缠绕 疾病的折磨 使他浑身消瘦 皮肤粗糙 衣服破烂 但意志却更为坚强。他向林中的隐者学习《吠陀经》、《奥义书》 掌握了苦行术 想通过传统的方法，用折磨肉体使心灵得到安宁。他在尼连禅河边的小树林里盘膝静坐，控制自己的呼吸，进入了虚幻的境界，每天只以一粒米维持生命。冬去春来，寒暑交替，6 年的时间过去了 释迦牟尼变得瘦骨嶙峋 形容枯槁 精疲力竭 但是他从苦行中并未找到解救众生的正道，于是决定放弃苦

行。他来到尼连禅河边，一任河水飘流。河边有一个牧场主的女儿，虔诚信神，每天来此用乳糜供奉神灵。她发现了饿得气息奄奄的释迦牟尼，急忙献上乳糜。佛陀恢复了体力和精力，决心独立寻找人类的解脱之途。他来到伽耶城外一棵菩提树下，铺上吉祥草，向着东方盘腿而坐，发誓说：“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，宁可让此身粉碎，终不起坐。”经过七天七夜的澄思净虑，他终于在最后一夜晨曦初露之时豁然开朗，大彻大悟了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菩提证道”。

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人生之道，主要有“四谛”、“十二因缘”、“业报轮回”和“涅槃静寂”等。四谛的“谛”字指确实无疑的真理，包括苦谛、集谛、灭谛和道谛。苦谛说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苦痛现象。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之苦，和憎恶的人相处（怨憎会）是苦，和喜爱的人分离（爱别离）是苦，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求不得是苦，总之人生真是苦海无边。集谛是讲人生苦恼的原因，在于自身的“无明”。众生愚昧无知，执著“有我”，故生贪、嗔、痴。贪欲驱使人们到处寻欢作乐，追逐权力，导致诸种恶行，招致“果报”。灭谛指停止轮回，得到解脱的涅槃境界，这是超脱苦海的唯一途径。道谛指现实涅槃所应遵循的方法和道路，释迦牟尼将其概括为“八正道”，即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为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“十二因缘”是对人生苦因的进一步分析。佛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因果联系，“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”。人生历程是由十二个相互连接的因果链条构成，因生来具有的盲目无知（无明）而生出意志和行为（行）；由意志引出个人的精神世界（识）；由精神现象而有主、客观

的区别名(色);有了客观世界便有了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种感觉(六入)进而有了与外界的接触(触)再进一步引出苦、乐的感觉(受);由感受而生渴望和贪爱(爱)从而就有了现实的人生(生),有生当然就有死(老死),反之从死向生逆观,可以看到人生诸种苦难又都是由“无明”引起的,所以修行的关键是克服人性中本有之无明。这样分析的结果,佛教实际是将人类的一切苦难统统归结为心理上的原因。我们认为,这些心理原因不是不存在,但不能用它来掩盖社会的原因,而后者才是主要的。“业报轮回”是佛教关于今生和来世联系的理论,他们从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继承了轮回说,但不承认人死后有不死的灵魂。佛教认为如果承认人的灵魂不死,那么他就会永远执著自我而不得解脱。参与轮回的不是灵魂,而是今生诸种行为所构成的“业力”。根据“因缘”理论,前世作业今生要承担后果,今生作业后世则必须承当。所以人死后,其“业力”继续在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等“六趣”中流转,其地位依其行为的善恶而定。这套业力轮回说,实质上就是变相的灵魂轮回论。中国僧人后来为了理解上的方便,干脆就讲灵魂不灭,生死轮回。要想摆脱循环不息的轮回,只有积累善业,依佛法修行,最终便可达到涅槃境界。涅槃是梵文 Nirvāna 的音译,意译则指圆寂、灭度,原指火的熄灭和风的吹散,是旧生命的止息,又是新生命的永恒。中文中没有可以对应的字眼,所以只好用音译,以求比较准确地表达佛教的涵义。佛教的《杂阿含经》这样描述涅槃境界:“贪欲永尽,嗔恚永尽,愚痴永尽,一切烦恼永尽,是名涅槃。”后世佛教不同派

别对涅槃境界的具体性状及其达到的方法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无疑都把它视为一种精神的状态。达到了涅槃境界，就是觉悟 也就是成佛。

释迦牟尼开悟后，来到贝纳勒斯城外的鹿野苑，向五个最初的弟子讲述他所获得的真理。他以浅显的语言，深入浅出的比喻，宣讲禅定修行，般若智慧，涅槃静寂，使他们深为折服 成为第一批信徒。以后又有 60 多人赶来听讲 组成了最初的僧团。当时官方的婆罗门教因腐朽而很不得人心，佛教独树一帜，发展很快。随着教徒的日益增加，为了维护僧团的纯洁性 佛祖规定信徒必须穿黄衣 剃发 遵从安贫、持律、清净身心的誓约。释迦牟尼又派弟子四出传教，使佛教的影响在印度迅速扩大，连许多国王也皈依了佛教。其中摩揭陀国的国王是他有力的支持者，国都王舍城是佛教传播的中心。这一时期 他门下招收了大目犍连、舍利弗、摩訶迦叶、难陀等一大批著名弟子。他曾回到家乡迦毗罗卫国，告别了年迈的净饭王，度姨母波闍波提、儿子罗睺罗出家。根据佛教典籍 佛祖成道后 共传道 45 年 主要活动在中印度地区，度化弟子无数，其中既有王公贵族，也有平民、乞丐、工匠、妓女 打破了传统种姓的束缚 实现了“众生平等”的诺言。当他 80 岁时，感到自己精力已经衰竭，大限将至。他离开拘尸那城，来到一片茂盛的树林中，宣告自己将要寂灭，身边只剩弟子难陀一人相随。佛陀头朝北躺在一棵大树下，月光透过树叶照在他的脸上，圣洁而又高尚。他告戒难陀切勿悲伤 在说出“有生必有死 精进勿懈怠”后 进入了微妙的禅定，无上的涅槃。拘尸那城的人听说佛祖圆寂后

非常悲伤。他们火化了他 舍利 骨灰 为摩揭陀国等 8 国所分。到了公元前 3 世纪 笃信佛教的阿育王执政 他又取出舍利分送各地建塔供奉，其中也有印度高僧将佛真身舍利带入中国。

佛祖圆寂后，他所创立的教团继续活动，规模不断扩大。佛祖在世，传教只用语言，没留文字。他死后弟子们感到无所依托，便集体聚会，由一名高僧背诵释迦牟尼的教诲，当众人认为这话符合佛祖本意时，便记录下来，便形成了佛经。这种背诵活动称为“集结”，在印度大规模的“集结”共有三次，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经典。佛陀死后百余年后，佛教僧团队伍逐渐发生了分裂，先是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，以后两派进一步分化，共分出二十几个教派，此时期称为印度佛教的部派时期。公元 1 世纪时，从大众部内产生出大乘佛教，以普度众生为旗帜，以便与提倡个体修行的部派佛教相区别。他们将先前部派时期所有教派统统称为小乘，意为他们只是小车小船，而自己则是大车大舟。大乘佛教在公元 3 世纪时，产生了龙树和提婆创立的大乘空宗，宣扬“中道观”和“般若实相”论。公元 5 世纪时又产生了由无著和世亲创立的大乘有宗，宣扬“万法唯识”说。此时的印度佛教处于鼎盛状态。公元 7 世纪以后，由于印度教的复兴和伊斯兰教的传入，佛教开始与传统的婆罗门教相结合，进入了密教时期。密教僧徒将大乘佛教理论和婆罗门教的修行仪规相结合，创造出了许多秘密法，以“真言密语”的形式继续流传，不过社会影响逐渐缩小。公元 13 世纪，伊斯兰教徒焚烧了佛教最后的据点超行寺，佛教在它的发祥地印度

正式中断，佛教的中心移到了中国。

二、慧风东煽

在中国佛教史上，佛教徒将佛教传入中国称为“慧风东煽”。关于佛教东传的时间 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如三代以前中国人已知佛教，西周传入说，孔子时传入说等等。形成如此众多说法的原因，是魏晋南北朝时佛、道两家争正统，按照中国越古越好的习惯，都尽力提前自己的创教时间。但是在争论中有些作者忽视了一个问题，即当三代或西周之时，在印度还没有佛教呢。据史家考证，佛教实际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两汉之际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东夷传》的一个注 引用魏国人鱼豢所作《魏略·西戎传》载：“昔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 2 年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《浮屠经》。”也就是说 是西域的大月氏国使者把佛教首先介绍到了中国。不过，这条记载未见于正史，可能只是使者与博士私人间的事情，国家并未过问。正史《后汉书》的《西域传》则载：“世传明帝梦见金人 长大 顶有金光，以问群臣。或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丈六尺而黄金色。’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法 遂于中国画形像焉。”汉明帝已经是东汉初年的皇帝了，他梦有异象，群臣说是见到了佛，可见他们是知道佛的。于是国家正式派出了使者，到印度求取佛法 画回佛像。这条史料记载 已经是很确切的了。

到了东汉年间，有大批西域僧人来华传教、译经。其中影响较大的两位是安士高和支娄迦谶。安士高是西域安息

国的太子 因信仰而放弃王位出家“游方弘化 遍历诸国”，在汉恒帝时来到中国“通习华语”然后开始译经。他译经的地点在北方，20 年间共译出 30 余部，以小乘禅学著作为主。支娄迦谶是西域月氏国人，于汉恒帝末年到中国，在洛阳译出大乘《般若》系经典 13 部，主要在我国南方流传。由于他们两人所传教法不同，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南北方佛学界不同的风格。北方僧人重禅定，讲究宗教实践；南方僧人重般若智慧，侧重宗教理论的探讨。

不过，在汉代佛教的影响还很小。外国来华的使节、商人信仰佛教 政府概不干涉 但不许中国人出家。然而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，有较高的理论素质和较强的渗透力 渐渐地 中国信佛教者日多。按照史书的说法 中国第一个信佛的贵族是汉明帝的弟弟、楚王刘英。《后汉书·楚王刘英传》称 他晚年“学为浮屠 斋戒祭祀”。浮屠乃佛陀之异译，他虽信仰佛教，但显然并不了解佛教，而是按照中国传统，用斋戒祭祀奉佛。第一个信佛的帝王则是汉桓帝刘志（公元 147—167 在位）开始在“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”把释迦牟尼请进了皇宫。中国第一个僧人是严佛调，生当汉末的桓灵之际，是安徽临淮人。他因协助西域来华高僧安玄译经“见重于时”。受西域僧人的影响 他“剃除须发 着坏色衣”俨然是一个和尚。但是严格讲 他并未受过戒 还不是正式的僧人（参见《佑录·安玄传》），真正的僧人是在中印度律宗高僧昙柯迦罗译出《僧祇律》，剃度中国人之后才出现。中国最早流行的佛经是《四十二章经》这不是一部完整的翻译经典 而是从小乘佛教《阿含经》中摘录抄写而成。不

过，因其讲述的都是佛教的一些基本原理，且译出较早，所以曾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
第二章

拓展与生根——魏晋南北朝佛教

- 道安译经和制定“僧尼轨范”
- 玄学化的佛学
- 鸠摩罗什及其弟子
- 高僧云集长安城
- 南方两大佛教中心
- 儒释道的冲突与殊途同归

一、苦难温床

佛教两汉之际传入东土，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大。中国统治者及士大夫将佛教视为一种神仙方术，任其自生自长。但魏晋南北朝时代，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一时间僧尼成群，寺院遍地，士人出家，王侯舍身，佛教组织成为一支谁也不能漠视的社会力量，佛教文化成为左右全国人民文化——心理结构的重要因素。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的时期。

佛教迅速传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。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心态。从统治阶级方面看，得势者可以占有无穷的社会财富，过着极情纵欲、腐朽奢靡的生活。但是政治赌场得失急剧，一朝失势就会身首异处，诛灭九族，物质的享乐弥补不了统治者极度的精神恐惧与空虚。在士大夫方面，“九品中正制”堵死了庶族平民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。读书无用，报国无门，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挑战，清谈玄风由此而起。可是老庄之学“美则美矣”；“然未尽善”，仍不能为人们提供终极的价值寄托。在劳动人民方面，社会上一切苦难最终都要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。极度的社会苦难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看不到一点解脱的希望，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彼岸天国。社会的苦难，成为滋生宗教的温床。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，因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、深奥的思辨理论、形象生动的传教方式以及严密的宗教组织而见长。因此

它能适应当时不同阶级人们不同的心理需要，迅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、开花。

佛教迅速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不容忽视，即魏晋玄学的发展为中国士人接受佛教哲学准备了思想基础。传统儒学以道德伦理、经世致用见长，却拙于哲学思辨。因而两汉佛教初传之际，中国士人与西域僧侣之间缺少彼此交流的思想媒介，难以理解佛教精髓。玄学以道注儒，何晏、王弼等人提出“本末”、“体用”、“有无”、“一多”等本体论哲学范畴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士人的理论思维能力。“无”与“空”、“体用”与“二谛”，……中国哲学与佛教哲学之间找到了可以互相转译、理解的共同语言，可以彼此对话了。

统治者的宣传利用，更是佛教大发展的直接动力。在南朝，由于政治腐败，200余年五易王朝，几乎不到10年便有一次大的人民起义或贵族动乱。统治者感到需要一种思想武器来“揉化人心”。佛教善于把粗俗的宗教迷信和精巧的哲学思辨结合起来，具有“内可以系心，外可以招劝”的社会功效，故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。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扶持下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佛教组织急剧发展，在梁代达到极盛。有史料表明，当时全国有寺院2846所，僧尼82700余人。^①仅京师一地就有寺院500余所，故知晚唐诗人杜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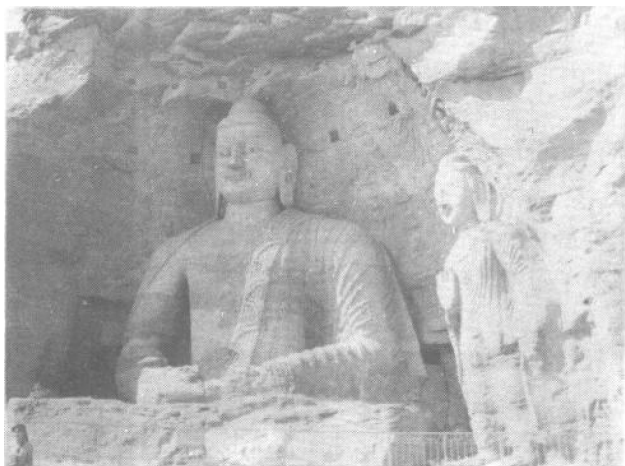
此数字出自唐法琳《辨正论》卷三。为当代多数佛教史专家引用，但与北朝僧尼200万相距太远。南梁郭祖琛上奏梁武帝说：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，穷极宏丽，僧尼十余万。”（《南史·郭祖琛传》）仅京师一地僧尼即十余万，全国近三千寺院，何止8万另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九之萧子显《御讲珂摩般若经序》载梁武帝在同泰寺讲经，与会僧俗人士319642人。依此推算，梁代僧尼应在几十万人。

《春日绝句》中“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绝非夸张。同时寺院经济急剧膨胀 和尚不仅占有大量良田“资产丰活”且荫占大量农民“天下户口 几亡其半”(郭祖深语)。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礼拜佛教同样虔诚、狂热。出于落后民族入主中原的一种自卑心理，他们对外来文化佛教却有一种认同的亲切感。他们以“佛是戎神，正所应奉”(石虎语)为名 大力弘扬。后赵石勒、石虎建寺庙八百余所 前秦苻坚发兵 10 万攻襄阳以迎名僧道安。后秦姚兴出征西域 夺得鸠摩罗什。在北魏佛教传播也出现了一个高潮，仅首都洛阳一地就有寺院 1367 所 全国僧人 200 万 译经 1900 余卷。举世闻名的敦煌、云岗、龙门三大石窟也是此时期开凿的。

二、高僧道安

三国、西晋时期，佛教由于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而加速发展。魏明帝曹叡曾大兴佛寺，陈思王曹植也喜欢读佛经，吴主孙权则在江东大建佛塔。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，民间佛教发展势头方兴未艾。西晋时，仅洛阳、长安两京就有寺院 180 所 僧尼 3700 人。

三国西晋时期佛教理论的传播还是以翻译为主。三国时期最著名的经师是支谦，其先世为月氏人，早年受学支谶 汉献帝末年避乱入吴 为孙权译出大、小乘佛经凡 88 部 118 卷。其中著名的有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大明度无极经》、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等。他还为自己译的《了本生死经》作注 此为



大同云岗石窟

注经之最早者。康僧会也是当时著名的西域经师，译有《小品般若经》、《六度集经》又注《安般守意》、《法镜》、《道书》三经。这一时期中土沙门开始了西行求法运动，魏时僧人朱世行是其先驱者。他因钻研《般若经》，感到旧译本文义不贯 翻译未善 故发誓往西域求取真经。他从雍州 今陕西长安县 出发 越过流沙到了于阗 今新疆和田县 写得《大品般若经》90 章 60 多万言，于晋武帝太康元年（291）遣弟子送回洛阳 由竺叔兰译成著名的《放光般若经》。他本人留在于阗 80 岁圆寂。西晋译经以竺法护最为著名，他祖籍月氏，出家后随师出游西域诸国，通 36 国文字 译出《光赞般若经》、《贤劫经》、《正法华经》等 154 部 309 卷，多属大乘。

东晋到南北朝，佛教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个高潮，道安正是在东晋初年推进这一高潮的第一位名僧。道安（314—385）俗姓卫，常山扶柳（今河北冀县）人。后赵时入岷（今河北临漳）师事佛图澄，后受请到武邑开讲，弟子极多。东晋兴宁三年（365），道安为避兵乱，率弟子五百余人到湖北襄阳，住了 15 年，每年宣讲《放光般若经》两次，推动了南方般若学的展开。东晋太元四年（379）前秦苻坚攻击襄阳，将道安及弟子习凿齿迎入长安，常以政事咨询。道安在长安住五重寺传法，受学僧众数千。从此直至 385 年逝世，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，制定了“僧尼轨范”，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将佛教推上了一个较高的水平。道安一生对佛教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整理佛教经典。佛教初传中国时翻译质量是比较低的。道安到了长安以后，利用帝王的政治支持，组织僧伽提婆、昙摩难提、僧伽跋澄等人翻译了小乘一切有部的《阿含经》及有关的论。西域沙门昙摩诗译出了《十诵戒本》、《比丘尼大戒本》、《教授比丘二岁坛文》等佛教戒律。在翻译活动中，道安亲自主持，与西域僧人诂定音字，详核文旨，提高了佛经的翻译质量。此外，道安还首次编定汉译佛经录目《综理众经目录》，对当时流行的诸经译本一一详考。道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，必须目见经本乃可入录，“遇残出残，遇全出全”，绝不盲从苟且，对于伪造经典详加考订，列入《伪经录》，这为佛教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建立教规教仪。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，一直被视为一种方术式的左道旁门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士人

对佛教缺乏了解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僧侣本身缺乏严格的戒律，未建立严密的组织。东晋时随着佛教戒律的大量译出，道安发起整顿佛教组织的工作。他主张僧侣废除世俗姓氏，出家人一律以释为姓。他自称为“弥天释道安”，此制为后世僧人遵行。道安还为僧侣的日常生活规定了轨仪规范，使天下僧侣的行为趋于统一，宗教组织规范化。

探索般若智慧，创立本无宗。般若是梵文 Prajñā 的音译，意译为智慧、智、明等，为区别于世俗的智慧，故用音译。《般若经》的全名是《大般若波罗密多经》，乃是印度大乘佛教中一个部派编集的论文集，汉代支谶就曾译出，社会上流行不同版本。“般若波罗密多”意译为智度、明度，为佛教六度之一，谓通过智慧达到涅槃的彼岸。在佛中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，要领在于抛弃凡人的世俗智慧，用般若洞照诸法实相，了悟现实世界的虚幻不真，把握诸法真如实相。因此般若经通篇内容都是诱导人们认识一个空字。但如何解空却在中国僧人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，形成了早期般若学中的“六家七宗”之学的争论。

三、六家七宗

中国僧侣早期译经、讲经，多采用一种叫做“格义”的方法，即把佛教理论与中国传统理论相比较，用某些类似的中国概念去与佛教概念比附、连类，以获得两种文化间的沟通。一般地讲，这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初期是难免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在中国文化母体中，老庄道家思想与佛教一致性较